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 RESEARCH ON CHINA'S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 政策变迁研究

RESEARCH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ANG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徐进 李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 政策变迁研究

RESEARCH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HANGE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徐进 李巍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 / 徐进, 李巍  
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201-0119-6

I. ①改… II. ①徐… ②李… III. ①对外政策-研  
究-中国 IV. ①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321 号

· 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

著 者 / 徐 进 李 巍

出 版 人 / 谢 寿 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0119-6

定 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时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国家实力的迅速增长，与国际社会交往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所面临和需要处理的国际问题更加复杂，这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提出了更多课题，对研究的深度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国际关系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国外交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提升到更高水平，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话语权不断提升，这要求我们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在关注和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时，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关注新情况新问题，在理论和方法创新上下足功夫。

为了进一步加强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使国际问题研究的理论水平跟上国家崛起的步伐，现实问题的研究能够与时俱进，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研究所创新项目基础上委托国际学部相关研究所、新疆智库、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单位，就“国际问题领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并于2016年上半年顺利结项。为了进一步扩大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将部分成果编辑整理成三部专著和一部论文集，以“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丛书”的形式集中安排公开出版。相信这批成果的出版与发行，对我们深化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认识，对我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我院在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领域学术影响力、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将起到重要作用。

这套丛书中的三部专著分别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和《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撰写完成。《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文选(2016)》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相关院所、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新疆智库以及世界宗教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就国际领域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所撰写的论文精选而成，共收集论文30篇。分别从“亚洲发展与中国周边”、“国际格局与中外关系”、“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世界左翼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反恐与伊斯兰研究”角度，对当前国际热点和难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当前国际热点和难点的最新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学术进步源于学术争鸣。对相关问题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之间就某一共同问题进行争辩、阐述各自立场，既有利于增进认识、形成共识，也是研究学派产生的重要路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研究》，回顾了过去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重大外交问题的讨论，涉及中国如何认识外部世界、中国如何定位自己与世界关系、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三个议题，并回顾了学者们为什么话题而争，有什么争论结果，这些争论有什么贡献与不足，这对于理解中国对外政策、了解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周边是一个文化多姿多彩、政治复杂多变、经济千差万别的地区，同时又是中国为了维护和延长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依托。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如何有效地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路径》专著，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维视角，着手从周边战略、价值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应该与东盟共同体、东亚共同体乃至未来的亚太共同体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共同推动亚洲的复兴，实现21世纪的“亚洲梦”，乃至“亚太梦”。

能否构建一个好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前提。《未来5~10年中国周边环境评估》，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未来5~1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周边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安全环境、区域合作环境、对华认知趋势等进行了综合评估与分析。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面对来自守成大国的打压、实力相近国家的阻扰和中小国家的担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影响力上升，中国的周边环境必然呈现出改善或向好的趋势。

研究当前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项复杂工程。当今世界，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世界中心向东移的趋势不可逆转。作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一员，中国如何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化解国际干扰因素，实现和平崛起将是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这就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国际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为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现实对策。我们期待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当代国际问题研究学科发展、为中国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贡献绵薄的力量。

# 目 录

引 论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	1
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十年学术争鸣	2
二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制定	5
第一章	关于时代主题的争鸣	13
一	第一次争鸣	14
二	格局转换期的思考与定调	17
三	第二次争鸣	17
四	总结与评论	21
第二章	关于国际格局的争鸣	22
一	冷战最后阶段的国际格局之争	23
二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之争	24
三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国际格局之争	28
四	总结与评论	32
第三章	关于国际主要矛盾的争鸣	34
一	“西西矛盾”论	36
二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	39
三	“南北矛盾”论	41

四	“无主要矛盾”论	43
五	其他观点	44
六	总结与评论	46
<b>第四章</b>	<b>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争鸣</b>	<b>49</b>
一	国家利益：有阶级性还是无阶级性	49
二	国家利益研究中的其他一些问题和争论	54
三	总结与评论	60
<b>第五章</b>	<b>关于中国实力与身份的争鸣</b>	<b>62</b>
一	综合国力衡量方法之争	63
二	软实力要素之争	71
三	关于中国国际身份的争鸣	78
四	总结与评论	79
<b>第六章</b>	<b>关于中国外交目标的争鸣</b>	<b>82</b>
一	中国能否崛起？	82
二	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	83
三	总结与评论	91
<b>第七章</b>	<b>关于中国外交原则的争鸣</b>	<b>93</b>
一	韬光养晦：坚持、调整还是放弃？	93
二	不结盟：坚守、放松还是放弃？	98
三	绝不当头还是学习当头？	103
四	中美关系与中邻关系：孰重孰轻？	104
五	未来的中国：一极还是超级？	107
六	总结与评价	109
<b>第八章</b>	<b>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的争鸣</b>	<b>110</b>
一	关于国际秩序：融入与怀疑	111
二	如何看待中国国际责任？	114
三	总结与评论	121



第九章 关于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争鸣	123
一 全球化源于何时?	124
二 经济全球化还是综合性全球化	126
三 全球化的客观性与主观性	128
四 全球化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吗?	129
五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权力吗?	131
六 全球化的利大还是弊大?	133
七 评论与总结	136
第十章 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争鸣	138
一 呼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阶段	139
二 呼吁建立“中国学派”阶段	145
三 尝试理论创新阶段	151
四 总结与评价	159
第十一章 关于研究方法的争鸣	164
一 为什么要重视研究方法	165
二 科学派的“破”与“立”	169
三 传统派和后现代派对科学派的批评	172
四 中间派的形成与方法论多元主义	180
五 评论与总结	182
结 语 代际传承与学术演进	184
一 第一代学者:重新审视世界	184
二 第二代学者:学科发展奠基人	186
三 第三代学者:多元方法、多种理论	187
四 第四代学者:多元理论、多个问题	189
后 记	191

# 引 论

##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

学术进步源于学术争鸣。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就某一共同问题进行争辩，阐述各自立场，这既是让真理越来越明晰的重要办法，也是学派产生的必由之路。一个缺乏学术争鸣的学科是沉闷的、乏味的，不能激起思想和智力的火花。

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正式诞生以来，国际学界共出现了四次重大的学术论战，它们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论战，20世纪50~60年代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之间的论战，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这四大论战直接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不同理论、不同流派、不同范式之间的竞争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sup>①</sup>但是，随着中国国家实力迅速增强，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所面临和需要处理的国际问题也更加复杂，这就要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水平跟上国家崛起的步伐。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落后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而要想解决这一问题，有价值、有深度的学术争鸣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争鸣是启发思维、矫正错误的必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为数不多，这一方面与国际关系学的学术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还需要培育一个更有利于学术争鸣的氛围。

---

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已经有较好的总结，比如，王逸舟主编《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本书围绕争鸣展开，不是对原先作品的简单重复。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学术争鸣还可以成为沟通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桥梁，成为学界与政界进行观点交流的平台。其实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多数与外交政策制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研究这些争鸣也是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和政学关系的一个窗口。由于中国没有美国式的“旋转门”制度，中国学者参与政策制定和外交运作的机会比美国学者要少得多。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学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较低。但具体情况到底如何还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本书两位作者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 11 次重大争鸣绝大多数与中国的重大外交政策转型直接相关。在争鸣过程中，各派人士争论得非常激烈，观点尖锐对立，而这种对立又与中国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相呼应。因此，学界分歧是反映政府内部分歧的，观察这些争鸣就成为研究中国外交一种间接而有趣的方式。

一个话题之所以能引起争论，说明这个话题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如果它能引起学界中人特别是重要人物参与，并形成一定的规模，那么就形成了学术论战，就更加凸显了该话题的重要意义。因此，回顾过去 30 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重大争鸣，回顾学者们因什么话题而争，有什么争论结果，这些争论有什么贡献与不足，对于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理解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曾经关注过什么样的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梳理和总结学术论战，难免要给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贴上学术标签”，尽管每个学者的观点通常都是丰富而复杂的，任何一个“标签”都难免有简化之嫌，但为了厘清争辩各方的观点，本书作者只能勉力为之。有些“标签”可能是学者愿意接受的，或者自己就如此称呼，有些“标签”是我们归纳出来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为了不对各位学者的观点误读，接近各位“参战者”的真实思想，本书作者尽可能多地阅读文献，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采访，进行综合比较，并且对关键性的论点尽量引用原文。

## 一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三十年学术争鸣

过去 30 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争鸣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十一个议题展开。第一个方面涉及中国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在这方面一共涌现出六个比较集中的争鸣议题，即时代主题、国际主要矛盾、国际格局、中国实力与身份、中国外交目标、中国外交原则。第二个方面涉及中国如何定位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在这方面有三个争鸣议题，即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与国际

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第三个方面涉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即如何构建“中国学派”，以及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国际关系学术争鸣的主要特征有三个。第一，多数学术争鸣有明显的为政策服务倾向，但学理色彩在逐步加强。上述十一个争鸣议题中，与政策直接相关的议题有九个，与政策间接相关的议题有两个。这说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步的主要动力仍然来自现实的对外政策问题。另外，学者在争鸣中所采用的话语正在逐步由政策话语主导向学术话语主导转变。这既得益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大量引进与普及，也得益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主意识的增强。就前者而言，国家利益、国家社会、全球化、崛起等学术概念的引进大大丰富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体系，并使旧有的话语体系迅速向国际标准话语看齐。就后者而言，中国学界在有意拉开自身与官方的距离，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反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该提法太接近官方意识形态，不利于独立的学科建设。进入21世纪，各类争鸣越来越形成自己独立于官方话语的学术话语体系，但客观上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政策圈与学术圈的距离在不断拉大。

第二，中国学者的自主意识和本土意识比较强烈。在过去30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自主意识一直非常强烈，即便像秦亚青、阎学通这样在美国受过标准学术训练的人，尽管他们主张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具有本土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学派的建立，这是上述学术争鸣的一个重大特征。另外，尽管西学东渐的影响非常强烈，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完全抛弃一些独具特色的中式话语。比如，时代主题和国际格局，这两个专业名词完全是中国式的概念，其中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这两个名词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观察现实世界和理解现实问题的基本思维框架。

第三，争鸣的议题受时代发展的影响较大。随着时代的发展，个别曾经激烈争论的议题到现在已成陈年旧事，比如关于国际主要矛盾的争鸣就是如此。而多数议题则随时代的脉搏而波动。有的议题（国家利益）在一段时间的争论后取得基本共识；有的议题（时代主题）开始有共识，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展争论；有的正在争论（中国如何参与全球化）。在上述十一个争鸣议题中，可能有两个议题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争论不休的。一是关于国际格局的争鸣。现在的国际格局及其变化趋势这个议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而且关于它的争论还与中国的身份、外交目标、外交原则等议题的争

论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关于“中国学派”的争鸣。近年来，中国学者的本土意识急速上升，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国际关系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以前“有人呼吁但缺乏成果”的状态相比，今天的学界已经开始涌现出一些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比如，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在最新专著中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这标志着“清华学派”的初步形成。<sup>①</sup>任晓、苏长和等一批上海学者正在努力以“共生”为核心概念构建“上海学派”。<sup>②</sup>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sup>③</sup>这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未来将使关于构建“中国学派”的讨论更加热烈。

上述争鸣的进步性在于它促使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术队伍。这一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21世纪头十年逐步加强。目前，一个规模比较庞大的专业性学术队伍正在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形成了比较规范的共同话语和共同规则。另外，它促使中国学者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到2005年前后，中国的中青年学者基本上能对西方主流理论耳熟能详。但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传统式的，缺乏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训练。自2003年以来，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开始面向全国青年学者开设“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培训班，这个普及性的培训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方法论意识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随后学界关于研究方法的争鸣使中青年学者进一步明确了方法论的作用，使其研究的学术性与可靠性有所提高。

然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仍然缺乏健康的学术争鸣氛围和习惯。首先，中国学界存在严重的“偏好伪装”问题，在很多重大议题上的辩论很不充分。中国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对事不对人”的争鸣风气，学者们总体上还是不愿意批评别人，也不愿意接受批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很多会议综述中，都只有观点，而没有留下这种观点的持有者是谁。虽然从这些会议综述中明显可以看出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但都隐去了名字，恐怕就是为了避免当事人的直接对立。所以，本书的出版也是希望能倡导一种健康的学术批评氛围，因为一个缺乏严肃批评的学科是难

①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② 任晓编著《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③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以改变落后局面的。<sup>①</sup>

其次,有些争鸣缺乏实证方法的支持。很多时候,一些学术争鸣会出现大而化之的现象,各方提出的一些问题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导致这些争鸣总是非常容易上升到哲学层面。而本书的两位作者均认为,国际关系是一门“形而下”的学科,面对的是实际问题,需要讨论的也是实际问题,而哲学层面的泛泛讨论无助于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个别议题的争鸣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话语的干扰和影响。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氛围受制于政治环境。没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就不容易形成热烈的争鸣氛围。但很多时候,中国学者自己主动制造一些不利于学术争鸣的环境。比如,少数学者喜欢拿政治话语来压人,特别是喜欢用领导人的讲话以及党和政府的文件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从而试图获得一种“政治上的正确性”。这种方式其实不利于学术争鸣和知识进步。

总体而言,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在争鸣中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但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还有一段距离,中国的学术研究离美国学派林立的局面还有很大的距离。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活跃性和批判性,这种批判性不是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式的,而是激烈的、对抗的。小范围的、短时间的辩鸣和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论战充斥着理论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甚至不少争鸣都是跨越国界的。学派的形成和健康学术争鸣格局的确立对于理论创新是不可缺少的。在学术探索过程中,没有彻底和永久的权威,学术的创造是挑战权力和权威的过程。<sup>②</sup>

## 二 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制定

在梳理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争鸣议题、特点、进步及不足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梳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研究这一互动模式的意义有以下两点:一是有助于外界观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如果我们能了解中国外交

<sup>①</sup> 张睿壮:《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若干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72页。

<sup>②</sup> 赵可金、倪世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381页。

方面的政学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外界在观察和研究中国外交时所遇到的资料上和信息上的困难。二是对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了解这一模式将有助于学者摆正研究心态，不必刻意追求自身研究的政策意义。

### （一）学术研究 with 政策制定之间存在脱节现象

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互动，中国学者此前也有关注与讨论。2009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sup>①</sup>

总的来说，与会者都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政策制订相脱节的现象由来已久。<sup>②</sup> 中国国际问题领域的学术研究脱离现实、落后于政策的症结在于：国内学术研究总跟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之后，缺乏创新；政策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又往往被西方设定的议题牵着走；学术研究存在“问题意识缺失”现象；相当一部分有意参与政策研讨的学者缺少相关政策资料及参与渠道和机会；虽然国内舆论环境大有改善，但“政治禁忌”问题仍然不时困扰学者。<sup>③</sup>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症结的办法，与会者观点各异。总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构筑中层理论以适应政策需要，而所谓的“大理论”对政策的适用性较差；二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特别是要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研究一些具体的、细节的政策问题，同时要加强对中国国情的深入

① 此次讨论会的发言均刊登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上。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第1~11页；王栋：《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第12~28页；朱锋：《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路径与方法》，第29~39页；苏长和：《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国际关系中的理论与政策之弥合》，第40~46页；于铁军：《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第47~57页；达巍：《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第58~67页；余万里：《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第68~73页；张志洲：《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第74~79页；宋伟：《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第80~92页；熊炜：《“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第93~104页。

② 脱节是指大量的学术研究作品不能为外交决策提供帮助。但是精确衡量脱节的程度是不可能的，毋宁说这是一种研究者与决策者的共同感觉。

③ 王缉思：《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4~5页。

了解；三是学者要掌握政策咨询的诀窍，弥合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差距。<sup>①</sup>

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之间的脱节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也出现在国际关系学最发达的美国。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与反思。比如，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教授指出，在美国，大量的国际关系学术著作不能为决策者提供帮助，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美国学界的体制不鼓励青年学者研究政策类问题；二是决策者没有时间去了解各种理论模型；三是决策者需要问题的准确原因和具体对策，而学者只能给出问题的总体趋势。<sup>②</sup>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sup>③</sup>总的来说，他们认为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对这一脱节现象的形成负有责任，但更应反思的是学术界。

中美两国的国情有较大差别，因此拿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情况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直接对比可能有一定的风险。中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人员和专业期刊的分化现象不如美国那么严格和固定。比如，在美国，大学教授和智库研究员是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前者被称为学者（scholar），而后者被称为分析家（analyst）。大学教授被认为是学术界的成员，而智库研究员不被认为是学术界的成员。因此，所谓理论与政策的脱节是指大学教授的研究成果不能为决策者所用。而美国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是很大的。智库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新思维、新方案、新议程，为政府提供专业人才，为官员和专家讨论

① 王缉思：《学术研究与管理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5-7页。

②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1, pp. 23-48.

③ Stephen M. Wal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3-48; Bruce W. Jentleson, "The Need for Praxis: Bringing Policy Relevanc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4, pp. 169-183; Alexander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and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3; James Kurth, "Inside the Cave? The Banality of IR Studi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53, Fall 1998, pp. 29-40; Joseph Lepgold, "Is Anyone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Policy Relevanc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3, No. 3, pp. 43-62;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alve Nincic, *Beyond the Ivory Tower: IR Theory and the Issue of Policy Relev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Mirosalve Nincic and Joseph Lepgold eds., *Being Useful, Policy Relev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Christopher Hill and Pamela Beshoff eds., *The Two Worl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ademics, Practitioners and the Trade in Ideas*, London: Routledge, 2000.



政策提供平台，充当政府现行政策的诠释者、风向标和试探器，并成为沟通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桥梁。<sup>①</sup>

在中国，大学教授和智库专家等通常都被称为学者，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中国外交决策总的来说保密性比较强，外界很难管窥一二，即使某些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所，普通研究人员恐怕对重大决策的酝酿与出台也难有耳闻，研究人员通常也没有机会深度参与外交决策。<sup>②</sup>中国的国际关系专业期刊虽然有一定的分化，比如《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研究》通常只刊发政策类文章，但不少偏重理论文章的期刊也会刊发一部分政策类文章，另一些期刊还把兼具理论性和政策性作为该刊的特色。基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情况，本文在分析学术研究与政策决策之间的关系时并不区分学术成果来自大学教授还是智库专家，而来自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会发表中国意义上的“学术成果”。

## （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学术研究：谁主谁从？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重大国际问题和重大政策的观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至少两种甚至多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分歧与重大外交政策调整之间存在何种互动关系呢？比如，当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今后中国外交的主基调是“奋发有为”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观念仍是要坚持“韬光养晦”，只有少数人主张放弃“韬光养晦”。那么，我们可以判定中央是吸取了少数派的观点而做出了政策调整吗？当中央的新政策（判断）与学界主流观点不一致时，后者对前者的牵制作用是什么呢？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第一，中国政府推出的新政策塑造学界的争鸣主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界新主流派的形成；第二，学界的作用在于它内含不同的理论、观念和建议可供决策者挑选；第三，如果新政策与部分学者所持观点一致，那不是这些学者主动影响了决策者，而是决策者因有意改变政策而主动选择这些学者的观点证明新政策（判断）的合理性；第四，与中央不一致的观点即使在学界是主流也影响不了政策转型，但是

① 陶文钊主编《美国思想库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17～21页。

② 政府官员可以根据需要向相关研究人员进行咨询，但一般不会允许研究人员参与决策。